

(第一辑)

浙江史学论丛

ZHEJIANG SHIXUE LUNCONG

浙江省历史学会 编



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浙江史学论丛

第一辑

浙江省历史学会编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史学论丛(第一辑)/浙江省历史学会编.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 6

ISBN 7-80633-668-0

I. 浙... II. 浙... III. 浙江省—地方史—文集
IV. K29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53026 号

浙江史学论丛(第一辑)

浙江省历史学会编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97719)
(E-mail:hzcbbs@mail.hz.zj.cn)

责任编辑 汤 敏

封面设计 李 莎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书 号 ISBN 7-80633-668-0/K·50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包伟民	计翔翔	戴成钧
范展	蔡文林	

编辑说明

浙江省历史学会是本省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者的群众性协会,成立于1957年5月,“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中断活动,上世纪80年代起恢复组织,焕发生机。半个世纪以来,浙江省历史学会对于促进本省的历史研究与教学,是起到了显著作用的。

近年来,在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指导、有关部门的支持,以及会员们的热忱的推动下,本会组织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如与杭州市园文局等单位合作,连续两次在浙江大学历史系召开以“杭州历史文化发掘与利用”为主题的研讨会,成立了历史教学与古城镇研究两个专业委员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召开了第一次“历史教学法研讨会”,在湖州南浔召开了“江南农村地区城市化”研讨会,最近又在杭州于谦祠召开了“甲申360年祭”学术座谈会。这些学术活动既提高了我们对相关论题的认识水平,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有一定学术见地的论文。为此,2001年12月在宁波大学文学院召开的学会规划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编辑并公开出版《浙江史学论丛》的计划,且希望它成为一个系列论丛的开端。然而主要由于筹措经费不易等原因,从计划提出到最终实施,竟历时两年有余。现《论丛》第一辑终于付印,令人不胜欣慰。

本辑《论丛》所收录论文的作者,既有史学界前辈,也有刚刚迈入史学研究门槛的新秀,更有活跃于中学教学第一线 的历史教师,以及来自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他们的论文当然并不一定都属宏论大作,但多出于认真的探索、独立的思考,以及实际工作的经验。一得之见,或有取焉。这或许就是《论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之所在,也是我们于时风日趋功利之际孜孜于此的原因。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即以实用主义为其中心价值观,所谓“学以致用”,即以教育为手段而非目的者明矣。我们的努力当然难以救时弊之万一,惟求无愧于我心,足矣。

计翔翔、戴成钧、范展、蔡文林等先生不计报酬地为本辑《论丛》的编辑做了许多工作。杭州出版社吕凤棠、徐吉军等先生为本辑《论丛》出版提供了热心的帮助,谨致谢忱。

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论丛》第一辑今虽已付印,它今后各辑的编辑、出版,尚有待于本会同仁的共同努力。

包伟民

2004年4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包伟民(1)
------------	--------

中国古代史

良渚文化与文明时代初探	徐日辉(1)
“小人物”发现“大文化” ——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评传	王心喜(12)
浙江缙云黄帝传说研究	王达钦(27)
吴越国的治国方略	李志庭(43)
钱镠独霸浙江的努力	王国林(58)
“尚方剑”考	周月峰(63)
中国古代史发散性思维举例	倪尔爽 缪银丹(77)
略论郭崇韬	谢大伟(83)
宋代绍兴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乐承耀(93)
略论南宋永嘉事功史学的基本特征	鲍永军(102)
胡三省逝世七百年祭	胡克均(111)
《通鉴》胡注析微	胡克均(123)
浅述明后期至清初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 的传播	江东跃(132)

中国近现代史

胡雪岩的“戒欺”观对现代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启迪····· 朱宝华(141)

关于胡雪岩及其诚信之道····· 盛久远(152)

近代浙东棉纺织业的双璧

——通久源纱厂与和丰纱厂····· 陈梅龙(158)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对报馆政治功能的认识····· 龚郭清(164)

从秘鲁华工案看晚清海外华人政策的演变····· 杨艳琼(173)

全面认识嵊县辛亥志士的历史作用

——兼为“嵊县强盗”辩诬····· 钱方来(190)

关于章太炎“反赤”

——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沈建中(198)

鹿城近代学运纪要····· 王兆庸(212)

影响现代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教育家陶行知

····· 胡国枢(221)

张静江与建设委员会····· 范 展(232)

浅谈温州风俗奢侈的原因····· 黄兰英(241)

试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探索····· 赖朝霞(251)

历史理论与历史教学

试论地理环境对古代温州经济发展的深层

影响····· 王兴文(261)

现代社会与中学历史教育····· 王加丰(271)

史料 理论 创新

- 论指导历史研究性学习的三要素····· 徐金超(282)
- 历史教学与美育互动探微····· 叶纪咸 王庭丰(287)
- 中学历史课程改革问题再探讨····· 章年海(295)
- 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及对策····· 郑慧日 陈 雅(314)
- 必须重视审题····· 计翔翔 陈斯风(324)
- 高考文科综合考试与中学历史教学····· 戚德海(331)
-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历史部分创新能力
考查形式探析····· 张 靓(335)
- 构建学生高度参与的历史课堂策略····· 张苏法(348)
- 激活历史课堂教学的几点做法····· 陈月霞(355)
- 课改后初中历史教学的几点思考····· 马惠琴(362)
- 使历史学会更好地服务于本省文化文明建设
——推进学会工作机制创新的一点体会····· 史学惠(369)
- 谈谈温州史学会对温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的贡献····· 张 洁(372)

世界史

- 我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创新之说····· 楼均信(377)
- 战后法国农村人口外流加速的原因初探····· 戴成钧(383)
- 论基督教财富观和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
关系····· 黄森君(396)

良渚文化与文明时代初探

徐日辉

良渚文化与文明时代的关系,学术界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1)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2)良渚文化未进入文明时代;(3)良渚文化未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本文认为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①。

当我们在讨论良渚文化与进入文明时代的关系时,一个有关文明的标准问题始终在影响着我们,这就是来自西方人的文明观。众所周知西方的“文明”一词产生于工业革命的18世纪,自19世纪以来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要数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人类社会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划分。具体是:“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终于下一期的开始。中级野蛮社会东半球始于动物饲养,西半球始于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使用土坯和石头来从事建筑,终于下一期的开始。高级野蛮社会始于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终于下一期的开始。”在摩尔根的阶段划分中,运用这几个标准非常重要,也是他建立三个时代的基石。不过用“高级野蛮社会始于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这样的标准,来对应中国的社会显然是不符合实情的,因为中国冶铁术的使用在春秋时期,大大晚于文字的使用。他对文明社会的结论是:“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直至今日。”^②显而易见,摩尔根是将文

字的发明和使用作为文明的开始,这一概念被后来的很多学者所采纳。对此童恩正先生指出:“从全面的眼光来看,这种分期法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创造,它是西方学术界历史观长期发展的结果。正因为这种三段分期法的形成源远流长,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带上强烈的时代烙印,这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时代的名称所反映的种族偏见和欧洲中心论上。”童先生还指出蒙昧(savagery)一词在人类学上应译为“兽性”,17世纪以来西方人在扩张的过程中,将新发现的美洲、非洲、亚洲的土著民族视为半人或兽性未除的“人”及灵性最高的“兽”。“直到1735年,生物学家林奈斯(Carl Linnaeus)在其《自然系统》一书中,仍将人分为两类,即人类(Homo sapiens)和畸人类(Homomonstrosus),非洲黑人、美洲印北安人、中国人均属畸人类。”^③显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尤其对中国人的看法更是荒唐。因此童先生认为:“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译本。将 savagery 先译‘蒙昧’,后译‘野蛮’,虽不说错,但却不能全面地反映原意。”^④童先生的看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文明”问题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还有把文明界定为文字、城市、青铜器、冶金术、国家等。其中比较通用的标准,即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称作文明的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有五千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所以有学者将夏商作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上限。人类在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与差异,造成了发展水平与速度的不尽相同。因此上溯到距今5000年前后,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达到今天我们的共识。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对于在考古学上如判断一个文化是否属于文明时代的问题,恐怕也不能简单套用流行的界说。特别是面对良渚文化这样在很多方面前所未知的考古文化,我们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寻求实事求是的结论。”^⑤李先

生的观点很有启迪,特别是他将良渚文化单独提出,更具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认为讨论良渚文化首要的一条就是以中国传统的“文明”观作为尺度,这样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新认识。

什么是文明?中国人有着传统的认识。《乾·文言传》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的“文”与“纹”相通。《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称:“即刻画之文饰也。”所谓刻画之文饰,就是依据自然现象而刻画的“纹”、“纹理”、“花纹”。庄子说:“越人断发文身。”^⑥“文身”即“纹身”,就是身上刺花纹。《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曰文”,其“文”即交错之“纹”。由此可见,最初“文明”之“文”,乃是交错之“纹”,源于先民们的刻画之“纹”,作为人文化的结果,最早见于距今 8220 年的甘肃西山坪一期的刻纹骨板^⑦。《易·贲卦》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亦作天纹。伊世同先生认为:“文明不只是一要文字,也是文样;古文字中,文与纹是相通的,天文即天纹,指天上的花纹或天上的图画。”^⑧先民看天,繁星点点银河闪烁,是一幅绝妙而永恒的图纹,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使先民们总结出以天纹图刻定方位观象授时,来区分冬夏。“文”是人类长期人化、文化、人文化的结果。所以唐人孔颖达在疏“文明”时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文章”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是智慧的结晶,也是承传历史和宣扬文化的载体,所以文章便成为文化的表明,才能谓之光明。因而,中国人传统认识上的以“文化”为标尺的“文明”观与西方的“文明”有着一定的差距。

二

正是基于中国的文明观和实际状况,学者们提出距今 5000 年前后,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严文明先生认为:“我们注意到无论

从文化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公元前 3500 左右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在此之前属新石器时代,从聚落遗址、房屋建筑或埋葬习俗来看,都比较强调统一和平等的原则;在此以后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考古遗迹清楚地表明这时已出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私有制、阶级乃至准国家的政治实体都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 3500 年开始。人们特别注意到牛河梁、大地湾和反山、瑶山等处的发现不是没有道理的。”^⑨严先生的观点很有说服力,符合中国文明发展的实情。严先生特地指出的反山、瑶山正是良渚文化遗址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处。反山遗址位于今杭州市的余杭区,1986 年 5 月 8 日—7 月 5 日,9 月 3 日—10 月 10 日进行了第一期发掘。此次发掘收获重大,特别是 3200 余件玉器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发现,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编号为 M12:98 甲型玉琮重达 6.5 公斤,堪称琮王。而琮上的神人兽面纹饰更是令人叫绝,作为“神徽”代表着良渚文化的精神世界。还有带浅浮雕“神徽”的玉钺、玉冠饰等,充分展示出良渚文化的文明进程。对反山的性质,发掘简报称:

反山墓地人工堆筑的“高台土冢”,土方达二万立方米左右。能够驱使大量劳力构筑如此规模的专用墓地,决非一般部族成员。墓葬格局和结构,显示了一定的等级规范,随葬品的丰厚精美,琮、璧、钺等玉制礼用器所象征的墓主人拥有神权、财富和军事统率权,尤其足以说明墓地的主人是一批部族的显贵。他们已经成为凌驾于部族一般成员之上的特殊阶层,或为巫覡,或为军事酋长。其中 M12、14、16、17、20 的墓主人更可能是身兼酋长、巫师的人物。反山墓地所出现的这些因素,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⑩

确如简报所言,反山基地的发现对于认定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样对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主持反山基地发掘的王明达先生认为:“经过局部解剖了解,良渚文化人工营造的反山这座土台,土方量高达2万立方米左右。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已发现的‘土筑金字塔’有数十座,其中反山的规格、等级最高,称之为良渚王陵是恰当的。”^⑪继反山之后,1987年又发现了瑶山良渚文化遗址。瑶山遗址位于今杭州市余杭区溪乡。瑶山遗址先后于1987年、1997年和1998年3次发掘,收获重大。瑶山遗址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高等级的“祭坛”。据发掘简报称:祭坛由三重构成。最里边的红土台,外围由灰土填成围沟,整个祭坛平面呈方形,外围边长约20米,面积为400平方米。同时还出土了近千件玉器。其中琮、钺、冠状饰的神人兽面纹饰与反山同属一类型。对于祭坛,简报称:“建坛的地点选择在山顶之上,如果仅是为了避潮防湿,不需要在山顶再建土坛。这高上加高应含有通向上天之意。坛作方形,和传统的‘地方’说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我们认为这类土坛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简报的结论说: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的发现,是半个世纪以来良渚文化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它对于我们研究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认识原始宗教在我国及东亚地区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⑫

对于瑶山祭坛,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是方国的象征。他说:“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后,即‘绝地天通’的

颛顼时代。良渚发现的带有墓葬的祭坛和以琮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应是宗教已步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瑶山等地墓葬最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琮、钺共为一个人的随葬物,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玉琮是专用的祭天礼器,设计的样子是天人交流,随着从早到晚的演变,琮的制作越来越规范化,加层加高加大,反映对琮的使用趋向垄断,对天说话、与天交流已成最高礼仪,只有一人,天字第一号人物才能有此权力,这就如同明朝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仪式时是皇帝一人的事一样。这与传说中颛顼的‘绝地天通’是一致的。这种权力集中到一人为标志的政权转折,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方国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大国下的小国群体。从区系角度分析,太湖流域作为一个大区系,内部又分为若干个小块块,是大区系下的小块块。所以认识到良渚文化已具方国规模,才更有实质意义。”^⑬方国是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之一。在这里苏先生认定瑶山为方国,即帝国的前奏,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外,在良渚文化遗址群中,余杭的汇观山遗址也发现了大型高级别的“祭坛”。汇观山遗址是 1991 年发现的,据简报称该祭坛平面基本为长方形,正南北向,东西长 45 米,南北宽 33 米,呈回字状内外三重。其形制与瑶山祭坛基本相同^⑭。从目前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的祭坛、礼器等,不断地证实着苏先生的科学论断。

三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从空间上讲,苏秉琦先生于 1981 年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即六大区系说^⑮。后来又调整为:(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为中心的北

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西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于距今五六千年的不同地区的观点,也就是著名的“满天星斗”说^⑩,反响极大。对此,吴耀利先生指出:“就中国文明的起源来说,主要是在以关中(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以江汉为中心的南方地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和以辽西山地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这五个地区起源的,也就是说,中国文明主要的是首先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是以关中、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⑪张忠培先生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公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⑫李仰松先生则提出初级文明与发达文明(国家)的观点,认为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各有特色的,又互有影响的文化的主体。在时间上他认为:“应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觅寻解决的线索,有幸今天我们已取得了一些主要证据。”^⑬这些证据就是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史前遗址,包括以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为中心社区的良渚文化遗址群。

综合专家们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空间的科学论断,为我们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于 5000 年前进入文明地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是由良渚文化自身的文化特点所决定的,特别是莫角山王城及大型宫殿基址建筑群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莫角山遗址位于良渚文化中心区内^⑭。今杭州余杭区瓶窑镇东部、良渚遗址群西侧,与著名的反山、瑶山、汇观山遗址相邻。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是 1987 年确认,1992—1993 年发掘,其揭露面积 1400 平方米。从报告中得知:莫角山遗址呈较规整的长方形,

东西长 670 米,南北宽 450 米,总面积 30 余万平方米,相对高程约 8 米。平台上又加筑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 3 座土台。其中大莫角山处遗址东北,呈长方形,东西长 180 米,南北宽 110 米,相对高度 6 米;小莫角山处西北,东西长 100 米,南北宽 60 米,相对高度约 3 米;乌龟山处西南,东西长 80 米,南北宽 60 米,相对高度约 4.5 米。此次发掘仅仅是一小部分,却也令世人大开眼界。其最大收获是:(1)莫角山是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并且是由良渚先民人工营造而成。(2)莫角山遗址长方形、正方向的形态相当规整,巨大的台基上又有大致呈“品”字形分布的 3 座土台,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恢弘令人惊叹。特别在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之间的区域内,约有 3 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夯层多达 13 层,最厚处达 50 厘米。(3)在小莫角山的南侧又发现了大型柱坑,虽然不明柱坑的总体布局,却已证知夯土基址上曾有相应的地面构建。报告的结论说:

如果我们现在对于近 30 万平方米的大土台是承载其上各类重要建筑物的大平台,三万平方米的夯土层是建筑物或“广场”一类的基址的认识得到基本认可,那么如此超凡的场所,绝不会是一般的用途,而只能是良渚文化各部族最神圣的礼仪中心。莫角山遗址从设计、营建、组织、指挥、劳动力投入、种种礼仪活动等诸多方面所显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之一。^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莫角山遗址平台上不是报告所说的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 3 座土台,而是 4 座。据芮国耀先生讲:“50 年代之前乌龟山西侧还布列着与乌龟山大致等高的当地称作蒋家山的土台。”^②如是,台基上的土台就不是呈“品”字形分布,而是